

外国文学研究

跨域的集体形构与身份确认

——以马华小说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闫蔚雯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以及马来亚被日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1942年1月—1945年8月),是一段马来西亚华人抵抗侵略的抗争史与形构认同的民族痛史。从中国的南下文人在抗战前及战时辐辏华人的反抗力量、构筑“南洋—中国”共同体想象,到战后马华作家在多元文化意识的发展下不断重述历史、反思族群境遇,马华小说孜孜不倦地书写和塑造着有关抗战的记忆。而跨域的集体想象、幽微纷繁的个体经验、差异性的政治环境、移步换形的历史语境,都影响着记忆与身份的生成与呈示,“抗战”因此在集体话语与个体话语的变奏中不断转化。由此,马华小说的抗战书写不仅具有以“记忆之场”唤醒文化记忆、抵抗记忆荒芜、形塑族群身份认同的文化意义,还蕴含着在后抗战时代以跨域流动的世界视野反思世界性创伤问题的边缘经验。

关键词：抗战书写;共同体想象;身份认同;记忆政治

纵观马华文学一百多年历史,涉及或书写抗战的作品延绵不绝,且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创作风格。中国五四运动的辐射尤使得其与中国及中国文学相缠绕,由此导致的暧昧情势,在这南洋沃土上滋生。流亡到马来亚的中国南下文人的加入使得马华文学不断蘖生,他们将脚下的殖民地社会作为抗日的海外阵地,发出抗日援华的强音,奠定了其抗战书写的基础。而后马来亚日据的三年零八个月(1942年1月—1945年8月)所带来的战争创伤和盘根错节的社会政治纠葛,让其抗战书写成为诘问华人社会位置、追询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方式。因

此,书写抗战成了马华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而小说作为马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拥有最多的读者、最丰硕的成果,而且凝聚着相对完整的历史记忆。抗战书写正是一种有着历史持续性质的集体创作现象,其诉诸记忆的目的是回应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由此,马华作家设身处地地将自己想象性地隶属于一个群体,产生集体的归属感,获得身份认同的情感纽带,从而区别于其他群体。由是观之,马华小说抗战书写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及集体与个体的记忆、身份如何被塑造、筛选、增强、延续、重构,就成为研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历史的褶皱： 早期的抗战书写及其“史前史”

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实现的“革命话语”到“民族话语”的巨大转变，^①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马华现代文学甫一出世就植根于长期遭受殖民宰治的历史遭际。因此置身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语境，马华小说必须面对殖民性、现代性、民族性的多重历史问题。

华语与华文的海外传播肇因于世界性人口流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作为外来移民开始大规模前往马来半岛垦殖并定居。这时华人迁徙主要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此后番客们便络绎不绝地踏上下南洋求生存的路途，形塑了其离散漂泊的集体记忆。尽管下南洋充满了艰辛和苦楚，但其中熟人网络的作用以及新客与旧客的联系、承传使得南洋成为较优的选择。^②加之南洋的锡矿、金矿等接连被勘探，正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开采工作，华工因此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劳力备受殖民地政府的重视。^③

华人在南洋活动频繁并产生诸多积极影响，然而华工却未能迎来更美好的生活。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蔓延全球，原材料价格下跌，矿业、橡胶业等工业衰败，工人们面临失业。华人经济也遭受巨大挫折，许多华商在苦苦维系和破产之间进退维谷。而殖民地政府也改变移民政策，遣返华侨，限制男性移民入境。钟楚瑜的小说《囚笼》（1934）和一村的小说《橡林深处》（1935）就反映了南渡后在橡胶园做工的华工的双重困境。《橡林深处》中的亚材被工头诱骗，南渡后才发现自己是被雇用做割胶工人。工头不仅寻觅各种借口缩减发放的工资，还开设赌场骗走工人人们的血汗。此时的亚材若离开橡胶园则难找工作，而回国务农的道路也被阻绝，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拿到一分钱来接济他困窘的家庭。《囚笼》同样反映了南渡的割胶工人遭受着华人管理头目（猫头）的压榨。苦闷的环境里人们以及时行乐的方式消磨生命，而随着经济危机，其生存环境愈发恶劣。

这并非作家们的凭空杜撰，而是当时经济危机下普遍的社会情况：

自一九三〇年，南洋经济衰落后，莆田出外谋生的侨民，一批一批的失业归国。不独华侨的汇款来源枯竭，社会上反添了很多失业游民。^④

岑溪和容县是广西出洋侨工最多的地方……以前每年华侨汇回款项约有三百万元；十八年起因受经济恐慌影响，汇款锐减；去年汇款只有十余万元，仅及十六七年的百分之五。近年华侨纷纷归国，使容县乡间骤然增加千万失业农民；依靠汇款补助家用的千万农家，更陷入朝不保暮的困境。^⑤

当时的华工有南渡后移居，建设新家园而落地生根的，也有怀揣着赚钱的梦想南下做工养育家庭，期盼有朝一日回到家乡的。瞻晞的小说《通舱里》（1934）却描绘了华工返乡后更为惨淡的现实。衣衫褴褛的老人几次三番到新加坡做路工，未赚到钱却被保卫团的人征去催捐，儿子的童养媳被团长引诱强占。村人伙同老人将童养媳打了一顿，却被扣上土匪的帽子，导致儿子被枪毙，老人迫于无奈也只能再次逃往南洋。而钟楚瑜《囚笼》里的扁头七也是在充任保卫团团团员期间，由于荒年米贵、无法养家而跑到被称为“黄金窟”的马来亚的。

因此，华工在国内深受剥削与压迫的生存图景与在南洋的移民生存图景并无太大差别，但二者分别代表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操纵下底层民众悲剧性的宿命。其中，关于南洋与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始终在运作。“在中国闽粤两省，这种关于南洋财富的想象广为流传，逐渐积累、

① 张武军：《半殖民性与解殖民书写——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历史重构》，《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② 参见彭家礼：《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劳力资源外流和“猪仔”贩卖的高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③ 参见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211-21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

④ 朱博能：《福建莆田的农村金融》，《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8号。

⑤ 农英：《容县玉林两县农村调查日记》，《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8号。

沉淀为两省乡民的‘集体记忆’。”^①而在对于华工的书写中,这种集体的幻想被不断证伪,从而产生一种残酷、悲苦的现实记忆,而这种记忆常常是此前被个体闭口不言、刻意掩埋的,个体记忆就在这一阶段的小说书写中转变为集体记忆。并且由于新的集体记忆扎根于殖民行为、华人内部的阶级矛盾,华人自我生存的需要始终得不到满足,他们成为抗战发生前的历史“褶皱”和历史背景的一部分。

而南下的中国文人则充当了褶皱下暗部的重要发现者。文人的大量南下在两个时期最为显著:一是1927年国内国共合作破裂后,文人们为躲避政治迫害选择南渡;二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许多文人南下参与创办报刊、宣传抗日。^②艾芜、巴金、老舍、林参天、罗依夫、衣虹、许杰、郁达夫、曾华丁、曾圣提、吴仲青等小说家都曾南渡,在其创作中展现着他们的南洋经验。还有部分小说家虽不曾在居留南洋期间创作作品,但却以强大的文学影响力辐射了马华文坛。

前文提到的《通舱里》就以一位计划赴南洋教书的知识分子的视角,窥见了底层南洋劳工的悲惨命运和彼时国内动荡导致的各种社会乱象。而流浪的《南京人氏》(1936)则讲述了1933年夏到暹罗做英文教员的陈先生自称为南京人氏,却一直被学校校长和老师怀疑、认定为东洋人的故事。尽管该小说并未直接书写抗战,却表现了当时南洋华人对于日军南进的忧虑和对抗战事业的关注。

南下作家自身流徙所产生的漂泊经验与对国家战争的忧患心理结合,自然就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于反殖事业的关注。此时马华小说的抗战书写兼顾了对两地社会现实的观照,而非压倒性地宣传国内的革命思想,为国内的政治需要服务。有学者认为,在南下文人“既定”的民族国家意识下,异地的左翼文学创作和一些充满左翼思想的政论是促成马华新文学急速向左转的两个重要因素。^③而本文意在强调此时作为中国文学一支而“开花结果”的马华文学,它的左转不仅是不断接收中国文学辐射热力的缘故,而且在塑造南洋社会的转捩点上顺应了其自在的发展需要。

其间的革命启蒙话语深深扎根于南洋社会

现状,以批判、讽刺的视角展现了华人社会中的种种不公与黑暗。丘士珍的小说《峇峇与娘惹》(1932)就蕴含两个批判维度,一是揭露当时社会中土生华人数典忘祖、弃文化传统于不顾的现象与流弊,二是将经济危机暴露出的阶级矛盾以家庭婚姻的形式表露出来。其中阿美的反抗,似乎代表了无产者的觉醒。经济危机下显著的社会矛盾正是打破阶级垄断、启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时机,为宣传革命文学、呼吁启蒙觉醒提供了条件。将革命政治与日常情感伦理相结合的,还有枕戈的小说《他的美梦醒了》(1932),其中岩影对韞枝的迷恋使得他不再对革命感兴趣,然而在此之前他也曾痛骂过情感,提倡科学的文学、革命的文学,当他恋爱无望、人生陷入苦闷之时,革命反而朝他招起手。作者所意欲凸显和唤醒的,显然是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历史洪流、为祖国事业奋斗的崇高情感,然而这却恰恰说明“革命”与“恋爱”之间欲望的相互转化,最终“革命”成为岩影情爱欲望的替代物,“呈现的是五四时期和革命文学时期两种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冲突”^④。小说《南京人氏》也对青年知识分子陷入现代城市生活而不思进取、追名逐利的现实进行了批判。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为知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强调知识创造的价值在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其把城市视为罪恶的渊薮,很明显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具有立足南洋、心向中国的忧患意识,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诉求。

此时马华小说家进行革命启蒙的对象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尤其在作品中表露对底层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并试图将最为突出的劳资矛盾问题转化为革命反抗的动力。上文对

① 汪鲸:《适彼叻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群》,第11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② 参见郭惠芬主编:《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第21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③ 参见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第21~24页,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④ 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囚笼》《橡林深处》的讨论已论及这一方面,从政治性华侨刊物《华侨动员半月刊》上的一则《华工与敌绝交后敌马来亚铁砂输出锐减》来看,南洋社会的罢工潮对于日本在南洋的经济、军事、社会管理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①而这些写于罢工潮开始前的小说,无疑在南洋华人奋起斗争、抗日援华的过程中起到了酝酿、推动的作用。

尽管早期涉及抗战书写的马华小说良莠不齐,但由于知识分子南下前遭遇了半殖民地境遇,其在以祖国抗战事业为中心,呼吁民众参与抗日救亡、启发华人奋起反抗的基础上,尤为注意将南洋社会复杂的殖民情状、阶级矛盾、经济危机等纳入小说所要表现的社会背景范畴之中。因此,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融入南洋、立足本土的创作风格。其以中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启蒙话语迎合了南洋华人的需要,能够触及马华抗战书写中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殖民统治下形成的殖民与反殖民经验,进而为华人一致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指明了方向,并开始反映文人异地空间迁移、华人在地化过程中混杂的身份认同问题。同时,抗战书写作为在现实主义精神指引下的选择,还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发挥了华语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凝聚华族向心力的作用,其提高了华人的思想觉悟,并把南洋华人以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结成社群的团结方式,转化为以一种普遍的乡土意识、心理诉求和迫切的现实需要联结而成的“大集体”或“共同体”式的团结方式。从本土视角来看,这些小说为华人社会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提供了某种可能与参照。

二、“大集体”的记忆： 图绘中国与摹状南洋

随着文人的南下步履,国内关于战争、离乱与团结的抗战记忆被不断传播、扩散至东南亚。由此,传递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呼唤侨民觉醒的南洋抗战记忆也在文人笔下被次第生产,描写抗战前方(中国)与抗战后方(南洋)的小说作品同时涌现,形成多重复调,共同创造着“中

国—南洋”共同的记忆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9日,新马地区的中文报纸《南洋商报》、英文报纸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自由西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檳城公报与海峡纪事报》)和 *Morning Tribune* (《新加坡论坛晨报》)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一侵略事件。这些报纸的措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日军的侵略事实,《南洋商报》更是鲜明地表现出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华北日军之蛮横行动》《廿九军宣言誓与芦沟桥偕亡》等社论与报道中,皆使用了“我军”“敌军”这类字眼。^②地图《丰台形势》的配文回溯了1936年九一八纪念日的往事,“日本华北驻军,故意造成与廿九军驻丰台部队之冲突,随即以绝大压力加之华北当局,逼令承认日方所提条件”,意在询唤过去的集体记忆;后又以“今华北有事,我方将以如何重大之牺牲,始能将兵家必争之丰台收归我手呢”,^③意图唤醒华人的集体意识。抗战期间南洋华文报纸的日期、记录的事件日期昭示着时间上的一致性,提供着一种将南洋的读者与中国联结起来的方式,读者通过阅读行为不断生成跨域的抗战想象与对于中华民族的群体认同,这时的“中华民族”就有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④的意味。

在文字文本与图像文本的互文、“我方”与“他方”的表达之中,这些报纸文章内含了敌我区分政治化逻辑,以空间化、时间化的表述强烈表达南洋与中国华人的联结,并以紧张的对抗关系呼吁一种具有广泛共同利益、富有认同感与革命性的民族共同体。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民族”,是一个囊括了政治、地理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共同体符号,象征了“南洋—中

① 参见《华工与敌绝交后敌马来亚铁砂输出锐减》,《华侨动员半月刊》1938年3月31日。

② 参见《华北日军之蛮横行动》《廿九军宣言誓与芦沟桥偕亡》,《南洋商报》1937年7月9日。

③ 《丰台形势》,《南洋商报》1937年7月9日。

④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第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国”这一政治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的团结。

顺应战时需要,一些文人将国内抗战的集体记忆挪移、搬演到南洋。此类小说凝结了国内波澜壮阔的抗战血泪史,通过文人的再书写具有了定义战争性质的意义,起到了战时传递新闻和宣传、传播思想的作用。小说《黄浦江中的巨雷》(1937)就对1937年9月28日夜,中国军队夜袭日本军队的“出云号”一事进行了改编。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因海军潜水员的操作过急,水雷还未抵近敌舰就爆炸了。而小说则在生动描绘国内抗战事件的基础上,以“这一声巨响震动了这可怕的寂静的夜的都市,震动了整个世界”^①巧妙收束全文,从而避免了失败的负面情绪压倒高涨的民族情感。乳婴《小根是怎样死的》(1938)与《逃难途中》(1938)刻画了逃难的底层民众无路可走的绝望境地。铁抗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则刻画了爱国青年张建在家庭责任与民族大义的双重抉择间的摇摆。

以上论及的小说皆以中国场景为背景,具有旗帜鲜明的统战意味,很容易使人误解此时的马华小说创作全面受到中国文学与侨民意识的影响,属于中国文学的支流。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铁抗就认为:“因为马华文艺是属于‘华侨’的,而华侨是中国人,因此马华文艺自然隶属于整个的中华民族文艺,成为她的一个重要部分。”^②然而,马华小说的笔触并不只局限于英雄人物、底层民众,由于南洋地区华洋杂处的社会情况以及马华文学“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离散境遇,其所面向的读者与书写的形象更为多元。黄万华认为:“马华救亡文学一开始就有它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作品中较多出现了中国大陆(内地)现代文学中较少见到的异族形象。”^③在抗战时期,台湾人、日人、华人混血儿等形象在摹状南洋社会抗战情境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为场景的马华小说也对异族形象多有着墨。铁抗1938年的小说《运输兵阿部信一》写一日军运输兵受到反法西斯同盟的感召,意识到中日两国的穷苦大众都是法西斯势力的俎上鱼肉,融汇了战争之下贫苦人民普遍的和平向往与反抗精神。其同年发表的《在动荡中》则设置

了两个老同学对于国家民族认同的对比,塑造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洋鬼子形象,反映了战时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间谍斗争。

而在马华小说的革命历史叙述中,“间谍”似乎不仅承载着关于集体想象的国族表述,召唤出民族危机意识,更在深层次上始终指向华人的身份认同。丁倩《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的主人公因参加“一·二八”示威而入狱,出狱后在上海朋友家居住,遇到一位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东洋少妇。一方面,它讲述青年男女的恋爱、分别、南下,显然将爱国启蒙与爱情传奇进行了杂糅,采用了反映知识分子成长的革命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其书写的上海空间具有华洋杂处、战乱与抗争并存的属性,其间殖民性和现代性的交融与南洋形成了地域空间政治、经济形态上的相似与对照。丁倩同年发表的小说《委屈》则以淞沪会战为背景,讲述上海战乱时期杜先生一家因战争而经历的磨难与抉择。妻子敏子在救援杜先生亲戚时因日人身份被日本兵当作间谍抓走,遭受了非人待遇。而当她历经磨难终于归家,却因无法承受悲痛与侮辱,选择开枪自尽。这两篇小说所塑造的“间谍”形象均是遭受战争蹂躏、在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外界的猜忌怀疑夹缝中生存的人物。

这不仅呼应了南洋华侨华人高涨的侨民意识与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也体现了马华文学在地化进程中的本土体察。南洋华人华侨通过参与抗战活动的形式,形成象征性的民族纽带,因此获得了一种政治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基于对中国的情感,也融入了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和政治环境,从而有助于形成新兴的公民政治力量。铁抗曾归纳马华文艺的三种特质:一是以现实主义的写法反映马来亚华侨社会;二是基于马华社会现阶段的需求,以反封建和反侵略为任务,并配合祖国文艺界的主流;三是

① 高扬:《黄浦江中的巨雷》,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第143页,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2。

② 方修编:《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铁抗作品选》,第93页,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79。

③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册,第2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

超族际。^①以这三种特质来概括此时期的马华小说抗战书写亦中肯,这些抗战书写尽管以表现国内抗战为中心,然而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等多种思想相互交织,进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将跨国、跨族裔的战争记忆进行了联结,具有跨时空的反法西斯、为劳苦大众发声的鲜明立场。这些在中国左翼文学传统中被遮蔽的文本,却在南洋播撒了抗日救亡的种子,从而延展了抗战记忆的空间,承担了储存集体记忆、构造南洋抗战历史的功能,成为“中国—南洋”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随着抗战时间的不断增长,鼓舞与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英雄主义叙事已不能有效调动华人的积极性,暴露与讽刺越发成为抗战中后期马华小说的重心。陈南《金叶琼思君》(1938)和林晨《泡》(1941)都塑造了谋求个人私利的奸商形象,李蕴郎的《转变》(1939)则借助一个拉牛车的底层华人援华心态的转变,说明了抗战的影响扩大至身处南洋的每一个纤微个体。有些小说则更敏锐地发现了以抗日为幌子巧立名目、追名逐利的现象对于抗战事业及南洋社会的负面作用。如耘之 1940 年至 1941 年连载的《小囚人日记》书写华校中的教育乱象,反映了南洋社会在妇女问题上的封建腐化,也展现出了抗战在南洋华人社会中被化约为僵化的日常形式与肌理的情状,讽刺了新生革命力量被这种抗战大环境所扼杀的现象。哈莱的《沉浮的浮起》(1939)塑造了一个在抗战与否间摇摆的华校教师形象,老蕾的《作家圈》(1941)将笔锋转向华校的“进步”学生,揭示出他们抗战均是出于自身现实目的,对抗战事业并无增益。铁抗的小说《白蚁》(1939)则以“白蚁”直指那些远在南洋而心怀鬼胎地参与祖国抗战事业的大小人物,牙兰加地筹赈分会主席的侄子来探访他的叔父时,读着《星洲晚报》,称自己想到唐山去抗日,却把陕西延安叫作“山西延安”,在哄骗叔父买假古董时说“那地方洋楼马路满像样,八路四路都在那儿,委员长也常常去,我该去活动一官半职来救国”,还称自己要“到延安读抗日大学抗鬼子去”。^②

由此,抗战被消解为一个磨灭了悲壮与崇高的虚无口号,小说的作者们尽管以知识分子的

批判使命批判了彼时南洋抗战的黑暗与痼疾,力图以笔将南洋与中国结成更为紧密的共同体,却暴露出南洋华人自外向内的远距离想象中存在的集体幻象。跨域想象的差异使得“中国”实际上成为融合了真实与想象的他者化空间,个体基于各自的现实境遇与空间想象,对抗战施加着作用或反作用力。这体现了南洋土生华人与中国南下华人对于抗战理解的差异,以及由于跨域的差异和现实的取向所造成的相互误解。如上官彥的《非英雄史略》(1939)和萧克的《码头上小天使》(1939)书写战争之下流落南洋的中国人的生活,南洋本土的华人群体出于高涨的侨民意识,排挤这些逃难而来的中国人,这些经受战争磨难、失去家乡的南下底层民众被裹挟在“不抗日”的怀疑话语与无根的痛苦之中。在“抗日救亡”的宏大主流话语下,《非英雄史略》中连番失去亲人的老五变成了“疯子”和“赌鬼”,回国抗日,而《码头上小天使》中的小明只有在发现了东洋货船并进行报告后才被孩子们所接受。这足以证明在关于集体经纬的叙述中,个体对于共同体记忆与认同的吊诡性建构。

三、失忆与拾遗： 抗战记忆的多重变奏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后,中国与南洋的抗战均落下了帷幕。抗战开始成为历史的记忆与想象的标志,其后马华小说大多站在当下的时空召唤过去的抗战记忆。同时,随着他乡向故乡的转换与民族共同体的散场,华人的身份归属与精神认同更加变动不居,个体的彰显越发成为抗战书写的重心,关于抗战的记忆也就愈发在代际切换的时间进程中与紧张而混乱的现实相互辉映。作为“想象的真实”的抗战和作为“真实”的痛苦体验的抗战记忆,由此在马华小说家的笔下持续发生作用并生产。

① 参见方修编:《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铁抗作品选》,第 94 页,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79。

② 铁抗:《白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第 482 页,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2。

战后的马华文坛首先经历了“马华文学独特性”与“侨民文艺”论战的洗炼,这场论战树立了注重“此时此地”的现实主义描写与反映马来亚现实、服务马来亚现实的观点。在经历了反殖运动与民族独立建国运动的重重浪潮后,追求马华文学独特性成为马华文坛的主导方向,在地书写及本土化的探索延绵不绝。夏霖的小说《冲》(1947)塑造了关切祖国抗战消息的海南番客和因援助印尼被荷兰军队抓走的马来水手形象,展现了不同族群人们之间共通的人性。唐金福的小说《日军进甘榜》(2015)同样聚焦日军屠杀华人的事件,三族人民在日军残忍的屠杀行为背后展现出了超越族群的团结与关怀。此外,还有一些小说以展现战后南洋华人形形色色的苦难生活为主要内容,如萧村的小说《中秋》(1951)《山芭》(1951)揭露了彼时社会中的恶劣行径对无辜民众的残害,李汝琳的《内疚》(1963)讲述了一位在日据时期失去丈夫的妻子改嫁而使得儿子与母亲离心的故事,苗秀的《旅愁》(1953)描绘了萧瑟、凄凉的社会经济与生活图画,展现了二战后恢复殖民统治带给民众的灰暗前景。在战后的苦闷与沉郁中,许多作家也开始着力于披露日据时期无法书写的战争内容,力图发掘、生产与传播被掩埋的集体记忆。丘天的《复仇》(1948)、芸亦尘的《渡越》(1982)、原上草的《乱世儿女》(1985)、潘雨桐的《血色璎珞》(1988)等均展现了日军的暴行与沦陷期间各民族人民的悲惨遭遇,呈现了沦陷时期集体共同的战争记忆。

这一系列作品体现了马华作家们重述集体记忆中业已失落的生命事件的努力,这种书写的欲望,使这些作家们重新审视被埋藏在集体记忆之中的个体,因而催生了战后马华小说抗战书写中的多样人物形象,这又可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浓墨重彩的异族人物。战后的马华小说关注党派斗争、历史、经济、社会和族群等相互缠绕的复杂问题,且注重在小说中展现华人多元文化的族群特征。如林参天的《余哀》(1960)以两名白种俘虏在日军欺凌下的悲惨遭遇为中心,描绘了华人以外族群同样饱受战争的苦难与蹂躏的画面;韦晕的《乌鸦港上黄昏》(1956)讲述了一个老夫少妻的家庭走向破碎的故事,

却侧面反映了华人对于马来亚的认同及与其他民族相融合的现实;而姚紫的《窝浪拉里》(1965)反其道而行之,刻画了白人殖民者趋炎附势、自私虚荣的性格,用爱情的手段和“变脸”揭示了殖民者利用和欺压当地人民的行径。

二是作为以往抗战书写中不利抗战的负面因素的人物。在过往的抗战书写中,因不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人民的团结,马华小说对汉奸、间谍等负面人物予以强烈的批判。而战后人们在重新审视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种现象时,则能够体味这些负面形象中包蕴的多重民族矛盾与文化认同问题。如刘冷的《一个间谍的自述》(1946)就讲述了华人被欺骗而步上不归路的沉痛遭际,即通过个体的历史追述,将道德、身份、情感的复杂性重新彰显,而这种对个体经验的呈现正满足了战后社会对于补足、反思集体记忆的需要;黄崖的《煤炭山风云》(1967)以一个在抗日分子与日军势力之间周旋的医生的视角,展开煤炭山被日军占领后的风起云涌,刘医生阔别后的重访作为重新掀开集体记忆的开始,验证了以煤炭山为代表的记忆空间对于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的储存与建构作用。

三是抗战期间归国参加抗战的人物。与之前不同的是,作家们不仅描绘其在国内的种种境遇,还开始转向思考、书写这些人物在抗战结束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抗战期间,南洋华人回国当兵、参与救护队、加入南侨机工队的英勇事迹不在少数。对此,马华作家笔下既有描绘昂扬氛围与理想结局的小说,如沙平的《少年航空兵》(1948);也有不免带有灰暗色彩与苦闷心绪的小说,如姚紫的小说《阎王沟》(1965),描写了抗战结束后一位华侨机工寻找过去那有情有义的妓女而未果的失望心绪;苗秀的《河滩上》(1958)则更彻底地塑造了一个战后返乡的落魄华侨机工形象。^①这些小说反映出马华小说

① 参见张松建:《从英雄到凡人:马华文学史上的“南侨机工”》,《怡和世纪》第51期, <https://www.yiheshiji.com/post/%E4%BB%8E%E8%8B%B1%E9%9B%84%E5%88%B0%E5%87%A1%E4%BA%BA%EF%BC%9A%E9%A9%AC%E5%8D%8E%E6%96%87%E5%AD%A6%E5%8F%B2%E4%B8%8A%E7%9A%84-%E5%8D%97%E4%BE%A8%E6%9C%BA%E5%B7%A5>。

家发掘与重拾个体记忆的努力,这一过程自然促使个体记忆不断汇聚成集体记忆,使得集体记忆得以不断被强化和传承。

此外,仍有未经本土化归或保有一定侨民意识的作者,在家国情怀与民族记忆的作用下,创造和传播着一种共同体想象下流散的集体记忆。尽管战后以落叶归根的中国意识来整合南洋与华人命运的小说似乎已并不符合主流,但如何在华人复杂的社会历史境遇与流动的身份的基础上对抗战记忆进行书写与重塑仍受到关注。韩萌的《七洲洋上》(1950)通过七七事变后由马来亚衣锦还乡的唐番仔一家的命运起伏,反映了抗战至解放战争期间的种种乱象与战争带来的灾难和苦楚,尽管侨民意识仍主宰着小说的精神面向,但这一落叶归根的后果与惨状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华人归国的申伤。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1954)以受洋文教育的林峇峇和其受华文教育的儿子林细峇之间境遇和选择的不同来呈现华侨社会思想的变迁。“中国人”作为跨文化的想象共同体,仍然在这些小说中传达着一定的侨民心绪。随着解放与独立的脚步及个体生命意识与本土牵系的深入,侨民余绪则更为淡化了。如方北方后来的小说《树大根深》(1985)就体现出侨民意识向公民意识形态转换的身份认同。具有侨民意识的小说,在论战中往往被持“马华文学独特性”观点的论者所批评,认为其并非反映“此时此地”。正如方修所言:“‘此时此地’这四个字,本来必须取其思想精神,或者解释做‘为此时此地’,不一定要作‘描写此时此地’,或‘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解。”^①这些小说尽管带着侨民意识的余绪,却反映了抗战如何影响着两代华人的社会发展与思想意识。

1965年8月,新加坡华文文学随着国家独立脱离了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当局对华人文化持有排挤态度,马华文学随之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低迷。这一时期,创作上的困境尤其让马华文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写实主义的创作不再能够满足作家及历史的期待。《蕉风》等本土刊物在开始推介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刊发本地作者现代作品的同时,兼顾马来西亚的国情与民族色彩,^②从而使得马

华现代小说于20世纪70年代趋于成熟。抗战的历史与生存经验为作家思考边缘身份与精神诉求提供了一个关于集体性革命与个体力量的想象空间,而现代主义手法充当了血色抗战的过去与迷惘异化的现实之间相互转化的通道。抗战前的殖民统治、抗战时期的动荡纷争、战后的历史与现实的重负,使得作家频频涉及家族的历史与创伤的代际传承,其作品也因此而具有了重建集体记忆的创伤史的意义。

陈政欣的《送上山去》(1983)通过交错的时空写了一个家庭的四代人:逃饥荒、下南洋的一代,南洋谋生的二代,日本侵略的动荡中成长的三代及年幼无知的四代。饱受战争苦痛、无法忘却历史和为现实考虑、回避历史,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体现了华人的两种生存取向以及代际之间抗战记忆的差异。小黑在小说《白水黑山》(1993)中写道:“他们那一代人那么无私地为一个理想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我们始得以生活在幸福与安逸中。然而,我们也间接失去了那个时代多姿多彩的生活经验了。而且,也因此失去了设身处地的想像空间。”^③这实际上说明,抗战书写仍然暴露出与记忆者的文化认同和代际特质紧密相关的某些问题。小黑在《白水黑山》中进行了后现代的实践,成功地在历史的虚构与真实中呈现了马共宏大叙事的历史轮廓,^④这种叙事欲望被旅台的黄锦树所承继,他的抗战书写格外表现出华人家族中代际承传的持续性创伤。如《大卷宗》(1989)中移民后代在追溯前人历史、思考华人命运时,将“在时空中不着痕迹地消失,消失在历史叙述的边缘”^⑤。他把对文化记忆的寻找看作是华人身份中一种宿命的召唤,但小说中“我”最终的愤

①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第102页,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

② 参见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册,第94-9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

③ 小黑:《白水黑山》,马岩主编:《马华文学大系 中长篇小说1965~1996》,第549页,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2。

④ 参见朱崇科:《论马华作家小黑作品中的马华话语》,《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⑤ 黄锦树:《乌暗暝》,第2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怒与决绝则证明接续文化记忆的后果是处境的尴尬与生命的枯萎,由此表现出对战争记忆代际断裂困境所持的消极态度。

关于抗战的集体与个人记忆,在战后小说文本和意识的承传中,成为历史的烙印,寄托着马华族群的政治愿景与文化焦虑。尽管战争记忆中的复杂纠葛和认同危机仍然是马华小说一再书写与反思的重点,但受制于政治、文化环境的作用,抗战书写相较于前一时期已大大削减。作家们对于过往战争记忆的选择与再书写,虽然有助于重新建构华人关于“抗战”的认知,但在现代性的焦虑之下,创伤体验所形成的再书写的道德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对另外记忆的空间挤压和刻意遗忘”^①。

结 语

因马华小说的抗战书写从战争局势、国内外形势中孳生,又往往指涉着华人在本国、异地受排挤或进行抗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此其所内蕴的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再到政治认同的演进过程,正验证了王德威所论述的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命题^②。貌似恒久不变的记忆,实则具备不断裂变的可能。

在马华文学史上,抗战文学作为紧跟政治走向、反映现实的文学,对其地位的评价两极分化明显。推崇者如方修,批判者如黄锦树,从后者对于方修、杨松年关于马华文学史分期的质疑中,我们可以察觉出黄对于经典失落的强烈焦虑。^③黄将海外华文文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把以外来文学为主体的阶段、本土意识为主导的阶段看作是“前文学史”,对应到马华文学则为南下文人所创造的侨民文艺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前的时期,进而将这长久的文学发展历程摒弃在文学史之外,认为彼时之文学为“历史”,而非“美学”。^④可以发现,在“走出方修”,要求“出土与重探”的声浪中,^⑤抗战文学或被标签化为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泛泛之作,而被排斥在经典的建构当中,甚至被驱逐至马华文学史的边缘。对于抗战的书写与再书写,确然是有关记忆的政治。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于2008年编选出版的短篇

小说集《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又以重新检视马华文学中符合美学标准、堪称经典的小说作品的姿态,将铁抗、方天的小说作品选入其中。在这经典的再检视与筛选中,抗战文学作为抗战记忆的重要果实,未必能够起到重新凝聚共同体意识的作用,而在时间上向前追溯的这一行为,却足以增加编者自身叙事身份的合理性。

需要阐明的是,本文并非否认“走出方修”的必要与“出土与重探”的文学史意义。囿于保存意识的迟到与材料的缺失,许多有关抗战书写的作品无处可寻,而在纸媒衰落的当下,抗战书写的媒介也在悄然转换,由此导致了对于抗战书写传承与研究的双重困难。本文虽以现今可寻材料行文,却也对重返马华文学的现场与重写文学史抱着开放与期待的态度。总的来说,有关抗战的想象和记忆兼具先验性与经验性,在文本的承传中不断塑造着集体认同与个体差异,使得现实不是脆弱的无根之木,过去也不再是不可触及的幻象。马华小说中的抗战书写,因其思想结构和内部张力,为思考个体记忆的文化经验如何向集体记忆的精神谱系转化提供了重要样本,同时也为当代的世界文学补充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小文学”书写实践。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后遗民状态:马来西亚华裔小说中的跨族裔叙事研究”(26CXJH578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闫蔚雯,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南亚华文文学、族裔文学。

① 刘大先:《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第92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

② 参见王德威:《后遗民写作》,第6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

③④ 参见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第41、42-43页,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⑤ 参见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2002。